

客观性是价值中立的，还是价值负载的？*

——当代女性主义知识论与主流知识论的客观性之争

曹剑波 (厦门大学哲学系、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6-0042-07

客观性问题一直是知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女性主义知识论者把客观性问题看作是“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她们把主流知识论中的客观性诊断为价值中立性，并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重建了价值负载的客观性。由于探讨女性主义知识论是全面了解女权运动和知识论最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探讨女性主义知识论对客观性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价值中立：女性主义知识论对主流知识论客观性的批判

女性主义知识论者把客观性问题本身看作是“一个必须探讨的主题，即一个有待解释的历史和认识问题”^[1]。她们分析了主流知识论中的客观性含义，质疑价值中立的客观性是否可以得到，是否值得追求。

1. 客观性的多义性

“客观性”是个复杂的概念，有多向度的理解，其含义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客观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假设、看法、渴望和反感的杂乱集合，……其确切的含义总是处于争论之中。”^[2]梅格爾(Alan Megill)认为，有四种客观性，即“绝对客观性(即唯实论)、学科共识、辩证客观性(对象通过主客观过程之间的互动得以建构)和程序性客观性(即非人力的方法)。”^[3]哈丁总结了“客观性”概念使用的四种含义：(1)客观或不客观被认为是某些个人或团体所具有的属性；(2)客观性被认为是知识假说和陈述的属性；(3)客观性被认为是人们觉得很公平的方法或惯例的属性；(4)客观性被认为是某些知识探索的社群的结构属性。^[4]

在各种不同的客观性概念中，主流知识论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论一直崇尚舍弃主观性、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以价值中立为最高目标，并以“上帝之眼”自居，拒斥主体的情遇性。价值中立常常被当做达到客观性、衡量客观性的基本条件。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独特标志，就在于它的价值中立和无偏见的客观性，“客观性是科学知识的独特标志”^[5]。价值中立性被看作是客观性所必需的品格，“客观性的最大化要求中立性的最大化。……客观性已被理解为非有中立性不可”^[6]。

2. 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特征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主流知识论中的“客观性”概念被“纯化”、“非人化”、“非主体化”，变成与情感、直觉、意志和价值无关，与具体的人无关。价值中立性、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无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批准号:10YJC730001)、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立项号:2009B004)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0221058)阶段性成果。

偏见性 (impartiality) 和非主体性 (impersonality) 成为客观性的主要特征。结合他人的理解，可把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特点概括如下：

(1) 是主客二分的、与主观性相对立的。在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看来，凡是与价值、情感、利益有关的都是主观的、非理性的、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只有经验的或逻辑分析的陈述才能经受理性的证实，才是有意义的，并认为只有清除主观因素，才能达到真正的、完全的客观性，因为“一种理解形式可达到的主观类型范围越广，对特定的主观能力的依靠越小，就越客观”。^[7]

(2) 是非视角的，即超越认知主体的特殊情境，或者从认知主体的特殊情境中抽象出来的“无源之处” (from no where) 的。这种客观性被理解为无任何视角的观察，它包括在进行研究、形成信念时应该避免认知者自身的某些因素影响认知结果。这些因素指来自认知者的文化认同、社会阶层和性别等角度的特征，以及所有能影响人们理解现实并因此给观点划出界限的方式。内格尔 (Thomas Nagel) 认为，为了追求客观性，“不从自身之内的任何一种观点出发理解世界”，“根本没有任何特定的观点，只是把世界理解为无中心的世界”。^[8] 主流知识论正是借“上帝之眼”从“无源之处”看问题，从而把达到与价值无关的客观性作为认识的最高和终极理想，“传统的科学知识被视为以一种‘上帝之眼’，描述了客观中立的自然规律。”^[9]

(3) 是与人的情感分离的。在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看来，当认知者在情感上与所知对象分离时，会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它。认知者与所研究的对象分离，是避免感情色彩投射到观察实证数据这种错误的必要条件。这种客观性“一般被认为是由事实或由一些公正的、非任意的标准所决定，而不是根据我们希望事情应该怎样的愿望来决定的”^[10]。

(4) 是通过控制，尤其是通过对实验和观察的控制获得的。科学家在实验的条件下，通过控制所研究对象的性状，从中得到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被控制的实验语境，通常被认为在对对象进行研究时具有认知上的特权。实验条件下所获得的证据，通常被认为是对象“真实存在”的知识基础，相反，通过认知者与对象交互作用所获得的证据，如参与者的观察、对话、政治协商以及对认知者需要的关照，则被认为是主观的。这种客观性只对被控制的对象感兴趣，而不对所研究的对象的其他方面感兴趣。^[11]

3. 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批判

女性主义知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论，把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视为一种“神话、面具、矛盾和盾”^[12]，看作是自我欺骗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并对它进行了批判。批判主要包括“价值中立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和“价值中立的客观性是不值得实现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女性主义者认为，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是无法获得的幻想。价值中立的、公正的客观性声称可以揭示出所有的社会价值观，并把它们从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中驱逐出去，这种说法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

(1) 在实际操作中，辨认和消除的只是那些与科学共同体不同的社会价值和利益，如果某种价值观是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预设，那么这种客观性就不能辨认和消除了。例如，如果科学共同体系统地某些种族或性别（如黑人、有色人种和妇女）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而现实文化又是按照种族等级或性别等级进行分层的，缺乏足够多的批判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意识，那么，这个受益于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科学共同体很难把其中的种族偏见或性别偏见的价值观揭示出来。

(2) 各种政治势力如欧洲中心主义、纳粹暴力、种族主义、男性霸权主义和阶级剥削等，有意或无意地借助特定的科学规范与文化，对科学大举“入侵”，并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一直左右着欧洲科学的发展。例如，德国法西斯“通过把犯罪、贫困以及性异常或政治偏差等现象加到外科术语或者其他术语中去（这些术语似乎与政治无关），纳粹消除了这些社会问题的政治色彩……以科学或健康

的名义推销政治，成为纳粹意识形态武器库中一件威力强大的火器。”^[13] 这些特殊集团利益的计划和政策，决定科学怎样选择研究项目、怎样解释研究结果、怎样构造自然图景与科学图景去晓谕大众等，由于被科学的价值中立的烟幕弹所掩盖，往往不被重视，甚至遭到忽视。对此，哈丁指出“当前用来对客观性最大化的好做法的流行标准过于软弱无力，以致无法识别那种整个文化层面上的假定，而这些假定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选择哪些做法作为好程序”^[14]。

(3) 科学研究无法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不是客观的而是自反性的：求知者与未知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知识中最基本的元素。同其他的人类产品一样，科学知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渗透着社会利益。”^[15] 认知者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具体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将个人偏见和社会意识形态带入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科学共同体的研究传统和背景假设也会影响问题的提出、材料的取舍、证据的解释、理论的评价和选择等。不存在不受理论和假设“污染”的所谓“原始材料”或“中立观察”，也不存在超越历史和文化情境的透明、中性的科学描述语言。女性主义者主张科学是负载价值的，事实不会自己表达自身，它是人们创造和选择的结果，必须将主观性和情境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将价值标准作为确定科学事实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认为，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理想由于拒绝对所有影响科学的议题、内容和结果的社会欲望、利益和价值进行批判性的辨认，因此只能对历史和现实中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偏狭和歪曲解释，这种客观性是不必实现也不值得实现的。

其一，它试图发现并消除所有的价值因素，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价值和兴趣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坏的影响”^[16]，有些价值因素如推进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能系统地产生更少偏见和歪曲的信念。建构主义告诉我们，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并非外在地附加在对人类漠不关心的超验的科学之上，自然科学的最好的和最坏的历史都受到政治欲望、利益和价值的影响，都是通过它们建构而成的。从科学中消除所有的价值要素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为科学与价值这两个主题，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价值中立的、无立场的客观性“不能区分哪些文化因素拓展了我们的认识，哪些限制了这种认识”^[17]，可能把正面的文化因素排除出去，不利于知识的增长。“客观主义的问题是，因为它否认语境价值应该有任何认知权力，不能说明它们有时确实发挥的积极作用。”^[18]

其二，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会产生对世界的片面的说明，会推进父权制与帝国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价值中立的客观性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是“男性气质的”符号化，是被“编码为男性气概”的。在传统知识论的二元框架下，与客观性对应的是男性，男性气质也与理性、客观性、中立性相联系；女性和女性气质则被描绘为是感性的，或是感情用事、情绪化的，缺乏中立态度和逻辑能力，等等，女性因而被认为是与客观性相悖的。在知识论史上，“客观的 = 男性的”是一个有效的等式^[19]，它崇扬男性利益（或其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为在父权制文化中的处于优势地位的优势群体服务。哈丁指出“就客观性被等同于中立性而言，人们认为妇女似乎是不可能客观的。……客观性已被理解为非有中立性不可；中立性被编码为男性气概”^[20]。这种客观性概念借用作为“女性气质的”性别象征或陈词滥调的归属于女性性质的话语，诉诸代表错误和偏见的认知模式，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这种客观性概念，由于它主张男性气质比女性气质更易产生客观性，贬低“女性气质的”认知模式，忽略女性所获得的认知成果，剥夺了女性的认知权力，因而是不值得追求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已被编码为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哈丁声称，西方现代科学是理性的、客观的与普遍的说法，只不过是“文明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象征。这种客观性所主张的科学方法与内容，完全是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父权制有意图的共建。非西方世界中脆弱的群体因为他们“并没有价值中立，只具有自己的儒家、土著美国人、伊斯兰毛利人、犹太人或基督教的价值”，因而遭受了所谓科学的价值自由与客

观性的“粗暴与残忍的文化入侵的折磨”。^[21]由此可见，价值中立的客观性是不可能获得和不值得获得的，只能对历史和现实中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偏狭和歪曲的解释，是妨碍客观性最大化的障碍。为了“帮助澄清科学的基础，以便保留科学所教给我们的东西，使其更加客观”^[22]，女性主义者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理想提出了批判。

二 价值负载：女性主义知识对客观性的重建

在批判了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女性主义知识论者重建了客观性概念。然而这种批判并没有完全抛弃传统客观性的概念，而是通过加入价值因素把价值中立的客观性重建为价值负载的客观性。无论是朗基诺的共同体客观性，凯勒的动态客观性，还是哈丁的强客观性和哈拉维的情境知识的新客观性，无不体现了这种重建。下面仅以哈丁的强客观性和哈拉维的新客观性为例加以说明。

1. 哈丁的强客观性

哈丁把“假定客观性必须由价值中立来满足”的客观性称为弱客观，并认为“客观性从来没有，也不能通过价值中立而得到提高。相反，是反权威主义者、反杰出人才、供人分享的和解放的价值和计划提高了科学的客观性。”^[23]参照弱客观性，哈丁提出了她的强客观性的其特征如下：

首先，“强客观性”以“边缘人的生活”为理论的出发点。在传统知识论、欧洲中心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的影响下，包括妇女、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穷人等生活在不利位置的群体长期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斥；在性别上，科学的中立性、客观性被编码为男性和男性气质，女性和女性气质则被编码为感性、非理性，与科学和客观性背道而驰；在地域上，非科学、落后被编码为东方、非洲、南美；在种族上，迷信、愚昧被编码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等。以边缘人的生活作为“强客观性”的出发点，就是要从传统上本来被忽视的地方开始，从被传统知识论认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客观性的地方开始，从被认为是科学的“陌生人”和“局外人”那里开始，因而一开始就具有颠覆性。从边缘人的生活开始恰恰是因为这种角度能帮助人们看清科学发展模式的缺陷与不足，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客观性。哈丁说“‘从被忽视的生活开始思考’可以为客观性的最大化提供更严格且更具竞争力的标准。”^[24]“从‘弱者’的社会位置开始提出有关自然界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人，能够逐渐获得科学上的优势。”^[25]“从边缘人的生活”出发，可以直接改变男性霸权、欧洲中心、白人至上的视角，无疑有助于减少客观性问题上的片面与局限，是研究走向客观性“最大化”的一种方法。

其次，“强客观性”要求把科学研究的观念扩展到“包括对系统的……强大的背景信念的审查”，以求产生“最大化的客观性”^[26]。“强客观性”要求对知识进行历史和跨文化的审视，重点审视那些被文化与社会歪曲了的东西，或是被那些已在“起作用”的社会因素隐瞒、抵制的东西，即与主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妇女、少数民族、穷人的群体因不识字或缺乏良好的教育机会，无法与知识精英一样站在科学的起跑线上，也不允许或不被鼓励公开发表自己对科学和知识的看法，也根本没有机会形成和传播自己政治观点和科学观点。这些无法说出的看法，恰恰可能是对科学领导机构和教育体制最尖锐的批评。“强客观性”主张不同群体的人，特别是长期沉默无言的人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体现了女性主义知识论的政治学意味，有助于解答知识与权利问题的困惑，使民主、平等的基本理念贯彻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中。由于把什么知识确定为具有客观性或较高的客观性是以相应的权力来支撑的，传统知识论是通过对某些社会群体知识权的剥夺来实现其统一性和权威性的，因此，追求最大客观性的强客观性不仅要扩大对知识的探求和背景的评价，而且要拒绝建立在特权之上的科学普适性和统一性。

最后，“强客观性”具有“强反身性（strong reflexivity）”的特征。与弱客观性仅仅把知识的客体和研究程序纳入反思对象的范围不同，强客观性不仅要求批判地考察认知对象、研究的程序和成果本

身,还要求把认知主体及其背景假设、辅助假设、研究所在的文化情境纳入反思、批判和修正之中,“强客观性要求把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置于同一个位置,都要展开因果性的批判。”^[27]这是因为在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如问题的选择、假说的形成、研究的设计(包括研究共同体的形成)、证据的收集、证据的解释、什么时候决定停止研究、研究报告方式等,处于社会情境中的认识主体的社会立场、利益、背景假设、偏见和其它暂时的、视角的特征,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在观察和思考过程中,应该同时把观察者与思考者本身作为研究的内容。^[28]哈丁说“各种客观性在最大程度关注作为观察和反思的直接对象的自然或社会时,必须同时关注观察者和反思者——即科学家和与他们共享假说的更大的社会。”^[29]而且,由于边缘人更可能注意和质询占统治地位的视角所采纳的不被怀疑的被接受的陈述,因此,边缘人群进入研究领域有利于提高反身性。这也表明,反身性暗含有民主的因素。包含反身性和民主因素的强客观性,是更客观的研究过程所必备的核心特征,也是强客观性强于弱客观性之所在。哈丁的“强客观性”强调价值负载,“人们要考虑:在不完善的社会秩序存在于当今科学中时,某些类型的私利性而不是无私利性应该与最大化的客观性相联”^[30]。

2. 哈拉维的“新”客观性

哈拉维最先把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引入女性主义知识论,并把它作为客观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她说“我喜欢一种具体化的客观性(embodied objectivity)学说,……女性主义客观性指的是情境知识。”^[31]在她看来,情境知识就是对客观性问题的新理解,可以“给论证、解构、充满热情的建构、网络联结以特权,并期待知识系统与看问题的方式的转换。”^[32]哈拉维虽然没有直接给出什么是情境化知识的定义,然而在不同的地方,她表述了对情境化知识的理解。她用“视角”、“位置”、“光学”、“看”等几个隐喻形象地表述了情境知识的局部视角性,认为具体化的客观性在于情境知识,在于分裂,在于“看”的方式不同,并认为这种局部的视角具有认知的优势,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她说“分裂而不是存在,对女性主义科学知识的知识论来说,是特权的形象。”^[33]当然,这种分裂是关于不同种类的必要的多样性,它们不能被简单化为同形的位置或者是累积的序列。主体的视角是多维的,这种多样性在主体之内以及主体之间都适用,每一种视角都能与另一种视角结合在一起“看”,而不必成为另一种,任何一种视角都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合法性,“这就是客观性的承诺:一个科学的认知者不是寻求同一性的主体的地位,而是客观性的主体的地位,也就是说,局部的联结。”^[34]

哈拉维不但承认任何局部视角的地位,还进一步指出,某一特定的视角无法同时占据所有特权的或者被压制的位置,不同的视角之间要进行监督和批判。她说“同一性,包括自我同一,不会产生科学,批判性的定位才会产生科学,也就是说,产生客观性。”^[35]只有局部的视角才能承载着客观性。这种局部的视角是一种“客观的视角”,“它启动,而不是停止了对所有视觉实践的生成负责的问题。”^[36]

情境知识表明,所有的知识都是局部的和有限的,没有无偏见的无源之见,没有无偏见的客观知识。情境知识重视被遮蔽的“他者”的视角,关注他们看的方式和认知的方式,然而这种重视不是单一的视角,情境知识仅把他者看作被忽视的局部的一员,为局部的他者应有的权利辩护。虽然如此,然而情境知识并不意味相对主义的无差别性。情境知识论认为,没有一个视角拥有绝对的特权,各种视角之间也非绝对平等,都不能免于批判性的再检查和再解释,然而,对既定的目的来说,一些视角比另一些强,各种不平等的视角的共享与对话、联结与批判可以确保客观性的最大化,可以保证对世界的更充分的、持续的、客观的和变化的解释,也能有效地促进知识论、政治学、伦理学方面的对话。哈拉威说“持续的、理性的和客观的询问正好依赖局部视角的政治学和知识论。”^[37]与局部的视角相联系,她描述了一种负责任的科学,认为知识的主体要对所见之物负责,要承诺“自己讲的就是事实”、“自己讲的就是自己亲眼所见的”。而要保证这种责任就需要主体之间对对方的视角实施互相监督,主体之

间展开批判和交谈。知识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共同体，共同体能保证综合不同视角的知识的客观性。^[38] 情境知识是一种开放的、没有终结的，永远处于不断发展与更新的解释之中。

概言之，哈拉威的客观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普遍性话语，她主张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存在于具体化的实践中，存在于具体的历史特殊情境里，在这种情境化的知识中，没有一个视角是绝对有特权的，各种视角也并非平等的，而是重视各种视角的联结与批判，重视共享和对话。

三 价值负载的客观性的评价

对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价值负载的客观性，主流知识论的捍卫者提出了许多质疑。具体如下：

1. 提出价值负载的客观性的理由是否充分？

女性主义者认为，“来自证据负载理论、证据不足理论和各种形式的整体主义理论的论证，已经对传统认识论把客观性等同于严格的价值中立性和关联独立性的理想观念提出了质疑。”^[39] 其中，“非充分决定论题”是女性主义者提出价值负载的客观性，拒斥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理论基础。非充分决定性论题（the underdetermination thesis）认为，包括未来的任何观察在内的所有可能的证据，都不足以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充分地决定哪一个理论是正确的。朗基诺认为，每一种理论都能同样好或同样不好地受到现有证据的支持。相互竞争的理论的历史性与非充分决定性问题一起，导致“不仅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确定地支持一种理论而不是另一种]，而且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证据”^[40]。由于证据非充分地决定理论的选择，因此，在理论的选择过程中，必须借助证据之外的心理的或社会的其他因素来帮助。这说明，选择理论最终与政治的或文化的“世界观”、“说明计划（explanatory scheme）”或“解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work）”有关。以生物进化中对“男性-狩猎”与“女性-采集”假设的讨论为例，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家按照“男性-狩猎”的模式对化石数据进行分析，把尖石头看作男性狩猎、宰杀动物的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男性为中心的人类进化模型；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则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按照“女性-采集”的模式将尖石头看作女性挖掘、切割植物根茎和碾碎种子的工具，并由此发展出女性为中心的人类进化模型。这表明“男性-狩猎”和“女性-采集”这两种理论假设的选择不是基于证据的充分决定，“并非来自化石的记录或进化论的暗示，而仅仅是一种背景假定”^[41]，并非化石记录决定了理论的选择，相反，对数据的解答依赖于背景假定，化石证据仅构成对背景假定的事后支持。是附带有“解释框架”的影响，通过这种解释框架，有些数据被筛掉了^[42]，女性主义者的解释框架筛选出女性-采集理论的证据，男性中心主义者的解释框架则筛选出男性-狩猎的证据。因此，朗基诺认为，理论选择必须是相对由政治价值形成的解释框架，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中立的证据。^[43]

哈克断言，价值负载的客观性是从“科学中完全排除语境的（即外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是不可能的”中推论出来的，然而，这种推论是不合逻辑的。她说“也许真的科学家从来没有完全消除偏见；也许当他们判断一个理论的证据时，他们应该完全把他们的偏见排除在视野之外是不可能的；其结论不是，允许偏见决定理论的选择是恰当的。即使不可能使科学更完善，其结论也不是我们不应该使它变得更好。”^[44]

的确，理论的选择离不开价值因素的参与。然而，女性主义者并非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认可一切价值因素的影响作用。她们主张：有些偏见是认识的资源，有些偏见则是错误之源。她们的目的是利用作为资源的价值，以求获得更少偏见、更少歪曲的客观知识。哈丁认为，考察了政治假设、研究的价值和利益的女性主义立场会提高知识主张的客观性。这种考察，在研究过程中，会使研究者变得“可见”，从而使研究者的信念和实践成为经验证据支持或反对的研究结果的一部分。她说“把这种‘主观的’因素引入分析中，实际上提高了研究的客观性，减少了把这类证据从公众场所中隐藏的‘客观

主义’。”^[45]

2. 价值负载的客观性会导致矛盾吗？

女性主义知识论把女性经验和立场作为强客观性的来源，认为这种客观性比主流科学的客观性更强、更大，可以导致更少偏见和歪曲的知识。批评者质问：既然女性主义认为价值中立、无偏见的客观性是一种弱客观性，是充满男性偏见的客观性，那么为什么还要追求更少偏见、更少歪曲的、从女性立场出发的强客观性？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我们看来，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批评者误解了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知识论者拒绝把客观性当作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探求（objectivity as inquiry），正如上文所表明的那样，是因为这种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神话既不可能获得，也不值得获得；相反，女性主义知识论者倡导价值负载的客观性，不仅基于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因素的不可避免性，而且还把客观性当作追踪真理的探求（objectivity as truth-tracking inquiry）。这种客观性是动态的、语境的而非永恒的。此外，这种客观性超越有偏见的视角和特殊的立场，是通过主体间的共识来达到。^[46]这种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罗蒂说“客观性并不是对应着客体，而是与其他主体达成一致，除了相互间的主观性外，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东西。”^[47]图奥梅拉（Raimo Tuomela）认为，科学至少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方面是客观的；科学探索的行动者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的共同态度、共同意向、共同需要、共同信念，而非个人的愿望和偏见推动了科学探索；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公开的，至少在原则上是可重复的。^[48]科学研究的进程不仅体现了科学家的个性特征和世界观，而且渗透了科学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与背景信念，因此波普尔指出，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是能够被主体间检验（或主体间批判）的。建立在主体间性上的科学知识具有现实性或客观有效性。

3. 价值负载的客观性会导致相对主义吗？

批评者认为，抛弃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理想，过分信赖“情境”和差异，可能产生一种难以为人们所认可的相对主义。大多数女性主义知识论者强烈反对批评者指控她们是相对主义者，反对价值负载的客观性会导致相对主义，她们认为价值负载的客观性并没有说看法之间没有好坏之分，它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从不同的利益方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作全面的认识。女性主义知识论者虽然主张知识的情境性、条件性，但反对立场和知识的平等性。寇德认为，虽然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适用于一切实践活动的实践，没有适用一切计划的计划，但这决不意味着所有的概念框架、实践和范式都是纯粹主观的。框架、实践和范式都产生于共同的探究计划。为了保护它们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它们必须证明它们能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对话，并能在遇到日常问题时能有效地处理问题。她说“没有一种方案有绝对的解释力，并不说明所有的方案都是一样有效的。知识具有性质上的多样性；有些知识比其它知识更好。”^[49]女性主义知识论者并不主张所有的立场都同样有效，她们认为，被压迫者、贫困者和边缘人由于他们的压迫地位和不利处境而在知识论上具有优势。女性主义知识论者也不主张所有的解释都同样有效，她们认为“如果所有的解释都是同样有效的，那么寻找‘它是如何实践起作用的’就变得无意义了”^[50]。虽然女性主义知识论强调知识的情境性，然而由于它主张知识是不平等的，主张特权立场，因此，它不是相对主义。

注 释

[1][2][3][4][6][13][14][17][20][24][25]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夏侯炳、谭兆民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71页；第172页；第297页；第171-172页；第186页；第177页；第173页；第183页；第186页；第24页；第208页。

- [5]Stephan Fuchs, “A Social Theory of Objectivity”, Ullica Segerstråle (ed.) , *Beyond the Science Wars: The Missing Discourse about Science and Societ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00 , p. 156.
- [7]Tanesini Alessandra , *An Introduction of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1999 , p. 163.
- [8]Thomas Nagel , *The View From Nowhe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p. 61.
- [9][19]Evelyn Fox Keller ,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 129 , p. 75.
- [10]吴小英 《科学、文化与性别: 女性主义的诠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第 71 - 72 页。
- [11]Mary Tiles , “A Science of Mars or of Venus?” , *Philosophy* , 1987 (62: 241) , pp. 293 - 306.
- [12] Robert Proctor , *Value-Free Science?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 ,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 262.
- [15]约翰·齐曼 《真科学: 它是什么, 它指什么》, 曾国屏等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第 394 页。
- [16][26][30]Sandra Harding ,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p. 143 - 144 , p. 149 , p. 173.
- [18]Sharon Crasnow , “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andpoint’ and Knowledge” , *Science & Education* , 2008 (17) , p. 1095.
- [21]Harding Sandra ,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Challenges , Resources , Opportunities , Uncertainties” , *Configurations* , 1994 (22) , p. 319.
- [22]E. F. Keller , *Secrets of Life , Secrets of Death: Essays on Language , Gender , and Science* , Routledge , 1992 , p. 2.
- [23]Sandra Harding ,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p. 27.
- [27][28][29]Sandra Harding ,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 Linda Alcoff and Elizabeth Potter (eds.) ,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 Routledge , 1993 , p. 69 , p. 69 , p. 69.
- [31][32][33][34][35][36][37][38]Donna Jeanne Haraway ,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 *Simians , Cyborgs ,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 Routledge , 1991 , p. 188 , pp. 191 - 192 , p. 193 , p. 193 , p. 193 , p. 190 , p. 191 , p. 195.
- [39]欧阳康主编 《当代英美哲学地图》, 人民出版社, 2005, 第 713 页。
- [40][41][42]Helen E. Longino ,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 111 , p. 107 , pp. 106 - 111.
- [43]Helen E. Longino ,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Science?” , *Hypatia* , 1987 (2: 3) p. 60.
- [44]Susan Haack , “Knowledge and Propaganda: Reflections of an Old Feminist” , C. L. Pinnick , N. Koertge and R. F. Almeder (eds.) , *Scrutinizing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 Examination of Gender in Science*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p. 13.
- [45]Sandra Harding ,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 Sandra G. Harding (ed.) ,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7 , p. 9.
- [46]斯迪芬·弗尤兹 《客观性的社会理论》, 选自奥利卡·舍格斯特 《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第 173 页。
- [47]Richard Rorty ,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p. 71 - 72.
- [48]Raimo Tuomela , *Science , Action , and Reality* ,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1985 , p. 212.
- [49]Lorraine Code , “Is the Sex of the Knower Epistemologically Significant?” , Louis P. Pojman ,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1999 , p. 567.
- [50]Joan Acker , Kate Barry and Johanna Esseveld , “Objectivity and Truth: Problems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 Mary Margaret Fonow and Judith A. Cook (eds.) ,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 143.

(责任编辑 孔明安)